中国科学报
执行主编:陈彬 编辑:王之康 校对:何工劳
E-mail:bchen@stimes.cn

就全国而言,学科结构趋于平衡,全国范围并不缺医科,并不是因为医科发展滞后,所以要尽快成立、合并医学院。因此,在没有充分认证,即符合学科发展认证;没有需求导向,即真实需求而是为政绩、量化指标的情况下,盲目入局的现象当休矣!

办医学院:不可乱追的“新时尚”

■本报记者 温才妃

如果高校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体,那么,在它们各种奇妙的对话里,恐怕少不了这样一句:“今天你成立医学院了吗?”

近年来,高校合并、成立医学院的行为蔚然成风,俨然已经成为发展道路上的“新时尚”。近一年来,多所高校或成立、筹建医学院,或合并附属医院。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42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中,已有32所建立或筹建医学院,比例高达76%。

那么,热衷合并、成立医学院的背后,高校又看中了什么?

图片来源:全景网

“一夜暴富”的不良示范

医学院热还要从2000年说起。当年,教育部主导了自1952年以来的第二次重大学科调整,一时间高校掀起并校风潮。随着医学院的并入,凡是在计量性的评价体系当中,合并后的高校可谓“一夜暴富”,论文发表、科研经费、人才类型等量化指标在国际排名中飙升。

当时有关部门的初衷并不为做大体量,而是被国际上的一种主流观念主导—— 一所好大学必然要有一所好的医学院,因此,拥有一所医学院成为了行政命令下的追逐。

哈佛大学、东京大学等世界名校在成立医学院之后,不仅给所在高校带来了学术声望,也为其创造了丰厚的办学财富。因此,常有人简单地认为,“一家医院一年的流水几十亿元,高校多办几家附属医院就不愁办学经费了”。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采访中,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我国,医院几乎不给大学挣钱。医科大学的经费由国家财政拨款;大学附属医院由卫生系统管理,收入纳入国家财政。

记者了解到,我国的医院大部分是非营利性公立医院,医院的收入可用于支持自身建设,但向大学分红的行为是卫生财政绝对禁止的,即所谓的“纸上富贵”。

可即便如此,学术影响力的高回报也足以吸引高校加入这场狂欢。

在一份名为《一流大学建设高校2017年爱思唯尔高被引学者(医学领域)》的名单中,医学的贡献率卓著,如云南大学高达50%,中南大学为43%,中山大学为30%。

根据第三方高等教育数据服务机构青塔的统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医学部分从2000年到2017年增长了近35倍,其中,2011年增长率接近100%。医学实力较强的高校成为重大受益者,无论是立项数,还是立项金额,医学均为其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医院也希望背靠学术实力强的高校发展,因为缺少大学的依托,在国际交流上它们或多或少受到影响,在引进高端人才发展高精尖领域受到限制。双方都是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用大医院加重大学砝码,用大学加重大医院砝码。”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

三种入局的心态

旁观“一夜暴富”后入局,代表了如今大多数高校成立、合并医学院的心理。但入局的原因并不局限于此,与此相对照,每一种类型的发展路径也大不相同。

医科出身、长期关注医疗卫生事业的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指出,第一类高校办医学院是基于优化现有学科结构的需要,是优势自然外溢的表现。比如,一些综合性大学、新型综合性大学有较强的物理、化学学科以及生命科学学科,在生物物理、生物化学、动植物研究等方面也有优势,并且和其他医学院校有广泛的联系。这类大学成立医学院有一个共同特点:前期论证非常充分、采取小步快走的策略——小规模招生,逐渐扩大。

第二类即上述受到“一夜暴富”鼓动入局的高校。它们通常不为满足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甚至连医学发展的特点都没摸清楚。目标单纯而明确,就是让计量性指标短期内突飞猛进。

“匆忙上马无非两个结果——办不了也并不了。”熊思东表示,高校合并医学院的同时,医学院也在考察高校。如果谈来谈去仅停留在一年发表多少文章、申请多少经费等表面文章,双方能谈成合并的概率并不大。

此外,追逐量化的冲动不仅来自大学本身,还有地方政府。储朝晖指出,大学与医院的组合在很多情况下是行政领导的撮合,而非双方自主选择,因撮合产生的政绩,让领导产生了治下拥有一流大学、一流医院的成就感。

第三类情况则更为怪诞,出于满足低级好奇的需要,一些校长看到学校里已拥有工学院、师范学院、理学院,唯独缺少医学院,于是不假思索拍脑袋决定成立、合并医学院。

冲动办学的成功率不足1/3

食盐,中文名:氯化钠。

“用食盐的结构来类比医学院热现象,第二类情况不能叫氯化钠,而是氯混钠,简单地把两个离子放在一起,而没有发生化学反应,以致内部结构不甚稳定。”熊思东打了一个比方。

储朝晖举例,北京某知名高校附近的医院,曾经挂过一段时间该校附属医院的牌子,后来又回归军医体系。双方因利益结合,后又因体制改革散伙,让人看了 摸不着头脑。

实际上,像这样的例子并不止一个。

“鲁莽办医学院的成功率很低。保守估计,三分天下一分不到。”熊思东指出,主要表现为,一是1+1=1,仅在做统计图表时体现合并的资源,两家平时往来甚少;二是1+1<2,高校非但没有发展,反而被医学院的并入拖垮,在资源分配、办学形态上战线拉得过长;三是1+1=-1,两家合并后打得不可开交,甚至出现互相告状、举报的现象。

在优质医疗资源相对缺失的当下,奉劝高校谨慎成立、合并医学院似乎有剥夺高校发展权利之嫌,但是办了医学院才知道其中的苦衷。

一位曾从事医学研究的教授告诉记者,高校圈内有一句话:“如果你想把大学办‘乱’,那么请办好一所法学院;如果你想把大学办‘穷’,那么请办好一所医学院。”

法学院学者眼里不揉沙子,动辄以法律武器对抗不合理行为,是故给学校“添乱”;医学院器材设备昂贵,还未开办先砸上亿元,是故把学校“变穷”。

“就全国而言,学科结构趋于平衡,全国范围并不缺医科,并不是因为医科发展滞后,所以要尽快成立、合并医学院。因此,在没有充分认证,即符合学科发展认证;没有需求导向,即真实需求而是为政绩、量化指标的情况下,盲目入局的现象当休矣!”熊思东如是说。

什么样的高校才能办好医科

并不是阻止高校办医学院,而是要办就要办好。

别敦荣指出,一些大学走捷径——合并医学院,这固然在操作上可行,但却忽视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高校才能办好医科?

“毕竟办医科的根本目的是培养高水平的医药人才,不能做到这一点,就无法成长为学校的优势学科。”他说,我国长期坚持医科专业人才培养体制,独立设置医科大学、医学院,被称之为生物医学培养模式。而国际上对医科人才的培养趋势是要求医生既懂医又懂心理以及社会环境,被称之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因此,现代医学人才培养模式并不是单纯的医科模式,不是就医谈医。

就像冰山的支撑面是沉在海平面下的冰山,尽管它被统一命名为“医学”,但实际上体量庞大。

在别敦荣看来,办好医科不可缺少的学科基石是基础文科、基础理科、医学基础学科、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这就在客观上决定了综合性大学比理工科、文科大学更具备优势,后来者必须具有相关的学科优势。”

“学科是大学的核心,大学是否构建了完整的学科体系、医学的空缺是否影响到其他学科发展,是校长首先要考虑的事情。一切要以学科结构的优化、稳定和有效发展作为是否纳入的取舍,而不是做简单的拼盘。”熊思东强调。

他表示,“这还需要高校对医学本身有清晰的认识——它不是简单的基础学科,不是简单的应用性质学科,更不是简单的职业性学科。它是链条式学科,区别于一般学科点状、区块性的特点,自成体系。”

以医学与工科的两段式培养为例,其不同之处可见一斑。别敦荣表示,高校发展工科不大可能自建工厂,通常是通过签协议把学生派去外面的工厂实习一段时间。然而,医科学生到了临床阶段,必须长时间进入科室跟班实习,还要在不同科室轮转实习。这就需要高校建立自身的临床医学教育体系;临床医师既是医生,又是教授、导师,这又给高校办医院带来重大的挑战——社会高水平医疗人才的总量是相对固定的,采取挖一批高水平的临床医师组建高水平医院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周期长、投入大、临床难保障、学科特点特殊甚至只有医学人员才能办好本学科……当获悉这些成立、合并医学院的真相,政府、高校乃至医院领导作决策时也许才会更加“头脑清明”。

现场

创新设计中碰撞出新“花样”

——北京市大学生第九届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侧记

■本报见习记者 许悦

“要尝一颗草莓吗”“来颗樱桃吧”“自行车、摩托车、电动车都能停放”“车位多,省空间”……

这些话听起来像是在某个水果市场,又仿佛是在某个路边的自行车集散中心。但实际上,我们正身处于北京工业大学的校园内,这里正在举行北京市大学生第九届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每一个展位的参赛选手都在热情地招呼参观者,请他们到自己的展位看一看创新机械,听一听自己的奇思妙想。

完美融合的交流大平台

北京市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是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的北京赛区部分。从现场同学们的“吆喝”中,不难猜出本次比赛的主题——“关注民生、美好家园”。

此次设计内容主要包含了解决城市小区中家庭用车停车难问题的小型停车机械装置的设计与制作,以及辅助人工采摘包括苹果、柑橘、草莓等10种水果的小型机械装置或工具的设计与制作两部分。

由于有些参赛选手会用实物进行演示,作品展示现场可谓果香味十足,红红的樱桃、草莓,与冰冷灵活的机械手臂、杠杆网袋放在一起,却并未显得格格不入,反而乡土气息十足。

然而,赛场展示摊位的另一半则截然不同,升降起落的支架,精巧的自行车、汽车模型,都市气息扑面而来。

不同展示台的学生还会互相“串门”,彼此切磋、交流心得,赛场气氛火热。

“自北工大连续承办该比赛的5年来,组织方式越来越完善,学生参与度也越来越高。由于这是一个全北京高校展示的舞台,它增进了高校间、学生间的交流。加之领域内专家评委的参与与互动,对学生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看着热火朝天的赛场,北京工业大学副校长吴斌感叹道。

水果采摘“玩”出新花样

在一个摊位前,一名女生正戴着一只机械手臂不停地练习抓握。这看似是用于复健的手臂,却是最简易的采摘好助手。

“虽然现在大规模采摘使用的大型联合收割机研发已经很成熟,但是对于更广大的普通农民来说,最常用的采摘方式还是手工采摘,即抓握、工具剪切的过程。因此,我们设计了这款装置来辅助人工采摘。”这位女生来自北京工业大学辅助人工苹果采摘装置团队,交谈中,她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了他们的灵感来源。

通过演示,记者很快发现了这款装置的便利之处,该装置在抓握果实的过程中,能够同时完成茎秆的剪切,减少了采摘者的劳动步骤。

“我们这款装置还采用了最小力距法进行设计,剪切过程更为省力。”在一旁,有人补充道。

正是这样一个成本不到20元的小装置,却达到了省时省力的双重效果,为果农们带来了福音。

同样是机械手臂,对排展位,来自北方工业大学的学生却“玩”出了不同的花样。

“我们这款草莓采摘辅助机械装置,只需按一下按钮,机械爪就会根据自身的视觉识别系统自动进行草莓识别并采摘,唯一需要人力的步骤就是将机械臂采摘到篮子里的草莓收集起来。”团队成员们自信地向记者演示了灵活的机械爪。

他们进一步解释道,因为草莓果实排布比较密集,所以采摘时容易碰伤临近的果实。但是有了视觉识别系统,这一困难便迎刃而解,“识别系统存在的误差定位,基本能够做到一次只抓一颗,这就避免了抓取时导致旁边的草莓受损。”

旧小区改造让车位“活”起来

见识过了五花八门的水果采摘装置的“威力”,解决城市小区中家庭用车停车难问题的小型停车机械装置为我们带来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机械设计风格。

一个展位上的设计作品让人不禁驻足观看:可旋转的圆盘状底盘、中国风的纸伞状顶盖,让人联想到了童年游乐园最爱之一旋转木马。然而,这实际上是由中国农业大学团队设计的一款旋转式自行车停放装置。

团队成员告诉记者,之所以将底盘设计为可旋转式,是为了解决取车不便的问题。“我们的装置可以放在旧小区未被利用的一些边角地带,这里存在一些靠近里面的车辆停放、取用不便的问题。但是如果底盘能够旋转,这样的问题就不复存在。需要哪辆,转出哪辆即可。”

参赛选手在现场演示其作品。 许悦摄

由于外形设计的装饰性与美观性,这一装置除了可以放置在旧小区内,放置在公园中也是不错的选择。

如今的公路上经常车满为患,寸步难行。但这也阻挡不了大家学开车的热情。然而对于拿到驾驶证的新手们而言,最痛苦的莫过于“停车”。如何将自己的车辆不偏不倚地停进自家小区楼下狭小的停车位中,难倒了不少人。

北京科技大学团队设计的“女司机专用停车协助器”,为无数新手解决了这一问题。

“我们的协助器的名字中虽然提到‘女司机’,但其主要帮助的还是所有停车困难的人群。”团队成员笑道。

所谓的协助器是由一个四方形的螺丝杠杆装置实现升降,外加万向轮、电机做到自由移动,最后,也是该设计最大的创新点——配合手机App,实现停车自动化。

“停车难是因为司机在车里面操作,难以判断外围的距离。而使用我们的装置,司机通过App可在车外实现停车操作。”队员打开手机App演示道,“这可以减少开车新手不小的负担。”

本届大赛共收到了来自北京24所大专院校的204件参赛作品。

“作为北京市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的固定承办单位,北京工业大学这几年一直在做知行合一、创新等方面的工作,我们希望通过教学、竞赛、项目三者的有机联动来真正地促使高校学生得到全面的提升。而北京市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正是从专业竞赛的角度,让学生通过比赛,在知识能力的结合、人格品格的塑造方面得到了提升。”吴斌如是说道。

中国大学评论

大学『砸钱挖人』的症结在哪里

■尤小立

近来,有关国内大学“砸钱挖人”的报道和评论集中出现,当然有其现实的原因,但是通过舆论的影响来改变不合理的现状,也未必不是一条富于建设性的路径。

其实,早在9年前,笔者就曾议论过相关的问题。当时给“砸钱挖人”定义了一个相对雅观的名称——“计划性引进”(参见《对人才计划性引进的一点思考》,《科学时报·大学周刊》,2009年6月16日)。现在看来,这种“计划性引进”已经不再以“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为遮掩,它干脆直接诉诸政府的行政性行为。地方政府补贴赞助,全力以赴,与高校共谋,抢人才的战争愈演愈烈,在语言日渐庸俗化的今天,被直白地称作“砸钱挖人”,倒也算是合适。

我们自然不能笼统地说,“砸钱挖人”都属于非理性的行为。因为“理”是分层的,不同事物有不同的“理”,而越往下面的层次“理”也越多,这是宋代理学家所说的“理一分殊”。但这个“分殊”也并不一定就是行为合理性的证明。

拿大学来说,它是一个教育和研究机构,属于教育、学术的行业。既与学术、教育有关,它首先就应该遵循教育的原则和学术的规范,引进人才也不例外。

当然,以“与国际接轨”为口号的管理者会举例说,当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威廉·哈珀利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雄厚资金,说服了8位在任大学校长和近20名系主任辞职加盟,且以双倍年薪挖角克拉克大学,很快将芝加哥大学的名次提高到美国高校的前列。但这种掠夺性的收罗人才方式只不过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处于原始积累阶段的美国中西部高校的一种非常规手段。此类方式在当今美国高等教育界虽然依旧时有出现,但已经被美国学者斥为震惊同行的“厚颜的搜刮行为”。而事实上,芝加哥大学如果没有第五任校长托马斯·赫钦斯以及其他教授们对于市场化的抵制,以及对于学术纯洁性的坚守,也不会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可见,芝加哥大学的早期行为并不值得当作“成功经验”去效仿。

与美国大学市场化的“理”不同,国内大学“砸钱挖人”始终都是遵循着行政性的“理”。行政主导的计划性引才有两个标志:一个是头衔,一个是钱。前者是引进的标准,后者是与之匹配的价码。而总体上看,它都是以快速见效为目标,都是形式重于内容的。

以笔者观察,计划性引才一般都具有以下几个相互衔接的特点:第一是不透明。因为不透明,也就为个别管理者暗箱操作提供了条件。所以,第二就是个别管理者说了算。第三是超越现行体制。人才不仅是一人一价,各种特聘职称也可以任意授予。第四,由于缺乏相应规范的选拔机制,引进的人才一般都有熟人、同学的关系,或者以熟人、同学为中介来实现。因为是出于私人关系,人才们在相关的管理者调离或者退休后,便极易产生随时撤离的念头。这个第五也可称为“人走茶凉”。第六,既然私人关系远重于学校,引进的人才对于学校自然缺乏认同感。没有认同感,就不可能有超越个人利益的责任感产生,为学校服务则更是无从谈起。平心而论,为自身利益考虑也情有可原,但过分地为自己的出路考虑最容易转换成唯利是图。不少引进的人才在一所学校约定的服务期届满后,一而再地在“引进—服务”的游戏中主动“被引进”,就是例证。

现在有媒体呼吁,大学的人才引进要摘“帽子”、看“里子”,即摘去各种头衔,看真才实学。但依据行政性的“理”,“帽子”一旦略去,判断人才学术水准的高下和实际价值的尺度也就变得模糊了。因此,按照行政性的逻辑,风险最小的引进人才办法只有看“帽子”。

给各种“帽子”明码标价,仿佛是在走向市场化,实质上仍是行政主导。而一再水涨船高的人才价码,不仅破坏了大学原有的工资结构,助长了学校内部的贫富不均,也给大学以外的人造成了所有大学教师都已经“先富起来”的虚假印象,甚至还吸引了国家税务部门的特别关注。

行政管理本身的属性决定了它必然是重现实、轻理想的,而“重现实”最常见的表现,就是指标化、量化,其急功近利的诉求与大学教育理念之间的冲突是有目共睹的。大学如果不进一步落实“去行政化”,不遵循教育的原则和学术的规范;教育管理部门如果不改变以行政性的手段管理大学,不尊重教育及其规律,要改变目前大学普遍存在的“砸钱挖人”的局面,应该是不可能的。